

元代福建後山報恩萬壽堂所刻《毗盧大藏經》的刊行與流傳

趙暉

ZHAO Tun

趙暉(1993—)，四川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佛教文獻、版本目錄學、東亞漢文獻、域外漢籍等。在 *Religions*、《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中華讀書報》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曾參加第六屆東亞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2025）、第十八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5），參與 2021—2035 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重點出版項目（第一批）“點校本《中國古農書集成》”，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日藏《普寧藏》的編纂、刊刻與流布研究”（25YJC730003）。



JEARC 2025,3(1): 203–227

Original Articles

Correspondence to

ZHAO Tun

Yanan University

zht1993edu@126.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7275-103x>



Journal of East Asia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Vol. 3, Issue 1 (December 2025): 203–227

© 2025 by the Daesoon Academy of Sciences, Daejin University, South Korea

<https://doi.org/10.23239/JEARC.2025.3.1.203>

Day of submission: 2025.11.14.

Completion of review: 2025.11.27.

Final decision for acceptance: 2025.12.30.

P-ISSN: 3022-0335

E-ISSN: 3058-2105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Pilu Can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Pilu Canon 《毗盧大藏經》, engraved by followers of Bao'en Wanshou Hall in Houshan Village, Fujian, during the Yanyou reign of the Yuan Dynasty. Funded through donations, this canon was part of a broader initiative to republish the four major Buddhist canons. Its engraving style blends influences from Yan Zhenqing, Ouyang Xun, and Zhao Mengfu, with rounder characters and more spacious layouts compared to earlier Song editions. The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involved various engravers and resulted in diverse transcription practices. Although no complete set survives, scattered volumes are housed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e Pilu Canon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layout, the White Lotus Society's influ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ddhist texts and secular society in medieval China.

Keywords: Pilu Canon; Buddhist Canon Engraving; Textual Transmission; Print Culture in Yuan Dynasty; Materiality of Buddhist Scriptures

本研究旨在考察元代延祐年間福建建陽後山報恩萬壽堂白蓮教徒所刊《毗盧大藏經》的刊刻背景、版式特徵、文獻傳承與社會傳播路徑。通過文獻考證、版本比較與社會史視角，探討該藏經在宋元藏經版本譜系中的定位，並分析白蓮教與官方、民間互動對佛教典籍生產與流布的影響。研究發現，該藏採取“募刊合一”的社會運作機制，體現元代民間教團在宗教出版中的主體性與官民協同的彈性政策。同時，該藏在字體、版式上融合歐、趙二體，展現元代建本“秀勁圓潤”的風格，與同時期《普寧藏》《延祐藏》分屬不同刊刻系統。現存零本散藏於中外多機構，其流布經歷戰亂劫火，今已無全帙。本研究不僅釐清了該藏的刊刻性質與歷史定位，也為理解元代宗教出版、社會階層互動與文本物質性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 刻本藏經 《毗盧大藏經》 刊刻過程 文本演進階層互動

一、楔子

元代福建建陽後山報恩萬壽堂所刊《毗盧大藏經》（下稱元刊《毗盧藏》），是元代民間教團主導刊刻的重要佛教文獻。該藏承襲宋刻《毗盧藏》體例，以《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大部經為主體，刊刻於延祐二年（1315），由白蓮教眾陳覺琳等發起募刻，並獲官方代表亦黑迷失支持。目前該藏無全帙存世，零本散見於中外藏館，其刊刻過程、版本特徵、社會機制與流布路徑尚未得到系統梳理。本文旨在透過現存零本與相關碑銘、題記文獻，重建其刊行與流傳史，並藉此探討元代宗教政策、民間教團能動性與佛典出版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這部重要的漢文佛經目錄上承宋開元寺版藏經（下稱宋刊《毗盧藏》），下啟元湖州吳興妙嚴寺刊版藏經，在藏經刊刻史上有重要地位。研究該部藏經，有助於還原元代佛典刊刻概貌，把握大型佛經目錄的刊行過程。然而，由於該藏卷帙較少、收藏分散且多殘缺不全，因此，其刊刻行與流布問題至今未得到清晰的呈現。學界對元刊《毗盧藏》的關注始於20世紀。

目前在著述中提到該藏經的學者，主要有何梅(He 1999)、田海(ter Haar 2017)¹及小川貫式(Ogawa and Lin 1988)²。日本學者小川貫式最早指出其勸募主體為白蓮教團體，並區分“白蓮宗”與“白蓮教”在組織與教義上的差異（小川貫式，1988）。何梅（1999）對該藏進行了初步考證，釐清其與宋刻《毗盧藏》及元代《普寧藏》《延祐藏》的關係。田海（Barend ter Haar）在《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中，將該藏置於白蓮教社會網絡中考察，強調其民間性與地域分佈特徵。戴蕃豫《中國佛典刊刻源流考》則從刻經史角度，指出該藏為元代私刻藏經的重要代表。然而，既有研究多側重個案描述或版本比對，缺乏對其刊刻社會機制、政治背景與跨階層互動的系統分析，亦未充分結合物質文本視角探討其出版與流傳過程。

2008–2009年，元刊《毗盧藏》零本相繼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一、二批。³筆者搜集了國內各大收藏機構的零本圖檔，同時留意國內

外珍稀古籍拍賣會，閱讀了不少現存元刊《毗盧藏》的零本殘卷，對此藏的刊行過程與流布下落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以下先介紹元刊《毗盧大藏經》的關鍵問題，其次聚焦於此藏的刊行與流布的關鍵問題進行考辨。

二、《毗盧大藏經》的開雕緣起

元刊《毗盧藏》的研究，有三方面問題需要特別關注。首先是元刊《毗盧藏》與宋刻《毗盧藏》的關係。元刊《毗盧藏》在行款、內容、音釋等體例方面沿襲了宋刻《毗盧藏》。《毗盧藏》早期版刻字體頗類宋版，多繼承宋版用字。沿襲之餘，自然也有發展。《毗盧藏》字體開始融入時代特徵，尤其是吸收當代書法名家字體，舒朗流暢，優於《普寧藏》本。這種字體上的優化，是宋刻《毗盧藏》所沒有的。

其次是《毗盧藏》勸募地點的分佈。主持刊刻《毗盧藏》的是後山報恩萬壽堂。元延祐年間，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陳覺琳募刻《毗盧藏》；目前所見《毗盧藏》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寶積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大般涅槃經》刊記，勸募地點南方多而北方少，明確這一空間分佈格局，有助於呈現白蓮信仰的影響範圍。

最後是元刊《毗盧藏》的性質。《毗盧藏》是白蓮懺堂發起刊版的藏經，其最明顯的資金來源是以後山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為代表的白蓮教眾。由於是民間私刻藏經，出資者和刊工沒有統一的來源，因此部分文本的字形、字體等方面存在差異。通過這些差異，我們可以較科學地還原元刊《毗盧藏》的刊行與流布情況。

元刊《毗盧藏》刊刻於元代早期，留下了不少重要的題記，不僅包含了刊刻時間，且從中可窺知該藏的勸募地點。另外，該藏的用字也與宋刊《毗盧藏》有所不同，這些版式特徵都為分析該藏版本譜系、厘清宋元版藏經的版本嬗遞提供了重要線索。

（一）刊刻緣起

元代宗教政策在整體管控中仍具一定彈性，為民間教團的出版活動提供了空間。元廷對佛教持保護態度，同時通過賜額、封號等方式將民間信仰納入管理體系。白蓮教在元代一度合法，其教眾可建立堂庵、刊經造像，後雖因教派擴張與政治疑慮屢遭打壓，但延祐年間仍處於相對寬鬆期。元刊《毗盧藏》的開雕與禪宗《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寶積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大般涅槃經》四大部經較為流行有關。何梅在《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中提到，元代再雕《毗盧藏》，「旨在重刊《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小藏」。⁴戴蕃豫在《中國佛典刊刻源流考》中也曾提到了這四部經，戴氏言道⁵：

（元代）私版《一切經》，上述管主八刻藏。《大普寧寺藏》外，僅有白蓮教刊行四小藏。延祐二年，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後山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募緣雕鑄四大部小藏：《大般若經》六百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大般若涅槃經》四十卷，同後分二卷；《大華嚴經》八十卷，原八十四函，出資皆庶民階級也。經各面六行十七字，字體秀麗，優於元普寧寺版。⁶

同時，戴蕃豫在該書中提到「延祐二年，白蓮教所刻《毗盧大藏經》，即在建陽」。⁷從上述內容可知，陳覺琳等募刻《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經是《普寧藏》之外唯一可考的元代私版刻經活動，所刻各經版本優良。

元代募刻《毗盧藏》，旨在重刊當時需求最大的「四大部經」。⁸元刊《毗盧藏》尚未發現今人影印出版資訊，筆者唯獨在民國版《影印宋磧砂藏經》中找到了用作補配的影印本《大般若經》十五卷和《大寶積經》一卷。目前該藏只有福建鼓山湧泉寺、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有零本收藏。

元刊《毗盧藏》卷首有三行刊記，作：

「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後山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安，文武官僚同資祿位，募眾雕刊毗盧大藏經板，流通讀誦者。延祐二年月日謹題」。

卷末經題後一般情況下有一長方形施刻木記。記文後一般有「都大勸緣榮祿大夫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吳國公亦黑迷失」款識一行，卷末附本卷經文釋音。

通過以上刊記，可知元刊《毗盧藏》刊刻的動因與禪宗四大部經的流行密切相關，何梅指出，元代私刻藏經中，唯此藏與《普寧藏》並立。前者以民間信仰團體為主導，後者則由白雲宗寺院主持。刊記也明確說明，此次刻經活動得到官方要員亦黑迷失的支持，其身份兼具吳國公與集賢院使，為刻經合法性提供了官方支持。

元延祐二年（1315），福建隸屬江浙行省，與江西行省與河南行省毗鄰，從上述卷所附刊記亦可看出，當時陳覺琳、陳覺圓等募刻《毗盧藏》的影響力已輻射到周邊地區，這一刊經盛舉不僅得到廣大外地信眾的積極回應，還得到福建行省長官亦黑迷失的支持。因此，《毗盧藏》得以順利開雕，刊行流布。

表 1：元刊《毗盧藏》本《大寶積經》刊記

Table 1: Yuan-period imprint of the Pulu Canon edition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publisher's colophon

卷次	千字文函號	刊記
卷十	龍	黃州路麻城縣龔氏妙真、劉顯祥、陳氏妙清、林德廣、胡仲勝、程普壽、水氏一娘、朱大哥、熊覺明、李覺福、那氏五娘、鄒氏一娘、宮文仲、王氏妙法、楊氏妙義，已上各刊一紙，共成一卷，報資恩有者。
卷十八	師	陸安州陸安縣晏覺燈同妻子丁氏妙明共刊五紙，周覺力刊五紙，劉氏妙持同夫鄒覺悔共刊二紙，高覺海刊一紙，共成一卷，報資恩有者。
卷二十	師	光州固始縣李覺性、胡氏三娘各刊二紙，祝有才、李誠、張漢用各刊一紙，帥氏妙清刊半紙；陸安州陸安縣吳明祖同妻吳氏五娘、周氏妙新、周覺願、胡氏四娘、尤德明、李覺廣、朱氏七娘，已上各刊一紙，共成一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
卷二十九	火	建昌州控鶴鄉津濟堂周覺布、男周覺德合刊一函報資恩有者。
卷五十	鳥	江西道贛州人謝覺戒施三十兩，僧久珩、謝妙心、宋覺會、四會鄉大安裏居何逢元、劉覺直、李八都居住溫才英、李氏三各施十兩，共中統三定，刊經一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惟願世生生同生淨土者。
卷五十九	官	河南江北道汴梁省汝寧府光州固始縣回龍山古心堂陳覺圓募眾喜舍四十五定，謹刊斯經一十五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者。

卷八十三	始	江西撫州崇仁寧克仲舍刊一卷，祈薦父母宗親，超生淨界者。
卷八十四	始	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後山報恩萬壽堂副教陳覺琳，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安，文武官僚同資祿位，募眾雕刊《毗盧大藏經》板，流通讀誦者，延祐二年 月 日謹題。

元刊《毗盧藏》由建陽後山報恩堂副教陳覺琳等發願募刻，並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據《八閩通志》記載，後山報恩萬壽堂在縣西崇泰裏，建陽縣歷史上號稱「圖書之府」，再雕本刊於此地亦非偶然。雕刊工作的發起和組織者是白蓮教徒陳覺琳。另據《元史》記載，亦黑迷失在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曾奉命往「海外僧迦刺國，觀佛鉢舍利」，至元二十四年出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由此與佛教結下因緣。至元二十九年，福建行省建立，亦黑迷失被詔為平章政事，之後「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為集賢院使，兼會同館事，告老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詔封吳國公」。可見，仁宗朝的要臣亦黑迷失，在詔封吳國公後不久出任雕經都大勸緣。因此，元刊《毗盧藏》刊刻於延祐二年，以福建道建寧路建陽縣為中心，輻射到廣大地區。

（二）印刷技術與版式特徵

《毗盧藏》初刻於宋，再刻於元。元刊《毗盧藏》將原單獨成冊並附於函末的釋音部分改刻在每冊經後，版式風格異於宋刊《毗盧藏》。元刊《毗盧藏》版式繼承宋刻傳統，每折六行十七字，但字體融合歐、趙二體，筆劃流暢舒朗，與宋版顏體之鋒棱頓挫形成鮮明對比。相較於同時代《普寧藏》前期歐體、後期趙體的演變，此藏字體風格更為統一，體現了元代建本「秀勁圓潤」的典型特徵。該藏每折六行十七字，字體融合歐陽詢與趙孟頫風格，筆劃圓潤舒朗，區別於宋刻顏體的鋒棱感。與《普寧藏》（白雲宗主持）、《延祐藏》（官刻系統）相比，在字體統一性、版面留白與實用性上呈現獨特風格，體現元代建本從宋刻向明刻過渡的階段性特徵。（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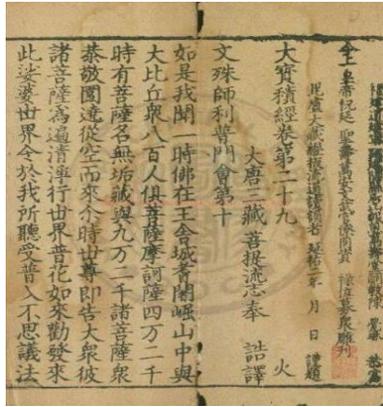


圖 1：元刊《毗盧藏》本《大寶積經》卷二十九

Figure 1: Pilu Canon Edition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Volume 29, Yuan Dynasty;⁹

此外，其釋音部分改刻於每冊經末，與宋版單獨成冊的體例迥異。兩宋建本，刻字體多取自顏體，橫輕豎重，筆劃鋒穎，頓筆較重，筆勾較鈍。《普寧藏》因刊刻時間跨度較大，前期流行歐體，中後期出現了趙體，兼有兩家之長。元刊《毗盧藏》則為歐體，筆劃較顏體為細，因此在運筆上顯得更為流暢（見圖 2）。



圖 2：日本增上寺藏《普寧藏》本《大寶積經》卷二十九

Figure 2: Puning Canon Edition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Volume 29,

Preserved at Zojo-ji Temple, Japan.¹⁰

元刊《毗盧藏》的字形、字體呈現異質的特徵。該藏部分篇什沿用了南宋刊《毗盧藏》的顏體字，線條鋒稜，筆劃較粗，橫輕豎重，頓筆明顯。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元刊《毗盧藏》，極易被誤認為是宋刊《毗盧藏》。該藏在沿用宋本顏體字之外，部分字形鋒稜較少，運筆圓潤，結構嚴謹，線條流暢，刊刻字體介於歐、趙之間，具有元代建本的典型特徵。元刊本《毗盧藏》，比之宋刊本，其字體更圓勁，經折處字間距更大，版面更寬。

元刊《毗盧藏》雖沿用宋版框架，但該藏在刻印技術上吸收了元代單刻本佛經的特色。例如，其經折裝幀與同期湖州妙嚴寺版「四大部經」相似，而版面留白增多、字距寬鬆的特點，亦見於元代民間單刻經卷。通過優化版面，改善僧眾誦經體驗，進而實現刊印技藝的革新，間接推動佛教典籍的世俗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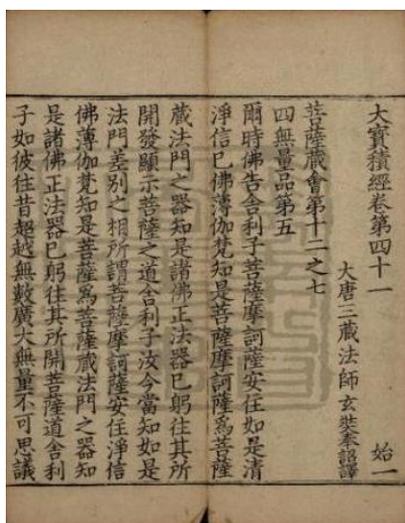


圖 3：雲南省圖書館藏《元官藏》本《大寶積經》卷四十一

Figure 3: Yuan Official Canon Edition of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Volume 41,

Preserved at Yunnan Provincial Library.¹⁰



圖 4：元延祐二年配補《磧砂藏》本《宗鏡錄》卷九十六

Figure 4: Qisha Canon Edi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Mirror of the Orthodoxy (Zongjing Lu), Volume 96, Supplement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Yanyou Era of the Yuan Dynasty.¹¹

表 2：元代各藏經版本特徵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anon Editions from the Yuan Dynasty.

特徵 / 版本	《毗盧藏》	《普寧藏》	《元官藏》	元補《磧砂藏》
版式	四周單線邊框，每版 36 行，行 17 字，每折 6 頁。	前期仿宋版，後期每版 30 行，行 17 字，四周單邊或雙邊，版框略小。	每版 42 行，行 17 字，每折 7 個半頁，版框宏大，天地雙線邊框。	每版 30 行，行 17 字，延續南宋原版，四周單邊或雙邊，版框尺寸近《普寧藏》。
裝幀	經折裝	經折裝，每版 5 個半頁，有護封及書衣，設計精美。	經折裝，每版 7 折頁，扉畫含舍利塔及釋迦說法圖。	經折裝為主，部分補版經卷附元代裝幀特徵（如黃麻紙襯頁）。
字體	融合歐、趙，流暢舒朗，刀法勁挺，接近宋刻。	前期歐體，中後期趙體，細瘦修長；行楷間錯，兼二體之長。	受趙體影響，較為規整，或有行書筆意。	南宋原版為浙本歐體風格，入元後吸收趙體的特色；元代補版融入顏體、趙體筆意（部分補版題記用行楷）。
行款用字	行 17 字，卷末偶有刊版題記、施資題記，多用俗字。	行 17 字，間注刻工姓名，標注千字文號、冊次、版次，多用俗字。	行 17 字，標注刻工（如「楊鼎刊」），千字文函號、冊次，用字規範。	行款嚴格統一，每行 17 字，補版題記標注年代、刻工（如「大德十年補刊」），用字規範。
其他特徵	目前僅見四大部藏，同吳興妙嚴寺藏經。注重功能性與成本控制，利於傳播，普遍性強。	分前、後期，後期簡化版式，日本散藏本為前期所刻，增上寺版多為後期，書衣題簽具六朝碑刻風韻。	目前僅見 23 種、32 卷，刊刻年代晚於元《毗盧藏》，具體時間待考。扉畫與經文結合，體現官方莊嚴性。	南宋開刻，元代補刊完成（約 1290-1320 年），元補部分規模超過全藏四分之三。補版刀法流暢，與《普寧藏》《毗盧藏》刻工有交集。

作為元初私刻的藏經，元刊《毗盧藏》補版技術影響了《普寧藏》，體現南北刻工技術的融合，在宋元藏經之中，頗具「過渡性」。《毗盧藏》在字體上延續宋版的顏體，並吸收《磧砂藏》補版的實用性，在卷次標注上融合了《普寧藏》的千字文系統，形成「宋體元用」的獨特風格。此外，相比元代單刻佛典如《天目中峰明本廣錄》的自由書風，元刊《毗盧藏》更注重宗教經典用字的規範性，而《磧砂藏》補版則兼具宋元刻工的技術平衡。

《毗盧藏》與《普寧藏》，兩者雖同屬私刻藏經，但《毗盧藏》因「募刊合一」機制，字形異體現象更顯著，多俗字和異體字，這反映了民間刻工書寫習慣的多樣性。一個時代的文本，往往呈現不同的形態，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所用字形也會呈現多種體式。元代募刻《毗盧藏》的是白蓮教眾，刻藏過程中實行包刻到人，每名募刻人負責一卷或多卷，參與雕造的刊工眾多，抄刻習慣存在差異，因而前後字形普遍存在俗體、異體的情況。從歷時角度入手，考察俗字異文的演變，可以把握宋元之際漢文佛典從「寫本原生態」到「刻本新生態」的文本演進過程。

（三）募刊合一

宋刊《毗盧藏》的版心有刊工信息，也是因為刻經行為是寺廟發起的，資金來源相對統一。元刊《毗盧藏》未著錄刊工姓名，但在卷末的勸緣題記中會出現該卷的勸募人名單。官刻本大藏經，因系官方出資，往往招募大量刊工，每名刊工要承擔多個版面。這種情況見於《磧砂藏》和《元官藏》。《普寧藏》雖是私刻藏經，但真正負責刊經的是南山大普寧寺下設的大藏經局，屬於專門的刻藏機構。

福建建陽作為宋元時期重要刻書中心，擁有成熟的刻工群體與出版網絡。後山報恩萬壽堂作為白蓮教地方堂庵，依託當地刻書資源，發起《毗盧藏》刊刻工程。通過分析元刊《毗盧藏》刊記，可知該藏是由建陽縣後山報恩堂多名信眾或施主共同出資募刻一整卷或幾個版面，刻工人均工作量少，經版刻竣由出資者直接向刊工支付工錢，經版上署名的只

是一眾出資人。因此，在署名方面，募刻人亦即刊刻人。加之資金來源分散，該藏主要依賴各地白蓮教眾與庶民捐資，實行“包刻到人”的刊版方式，導致字形、版式存在細微差異。這種“募刊合一”機制，凸顯民間出版活動中施主、刻工與教團組織的多重角色互動。

元刊《毗盧藏》的主要勸募人是各地白蓮教眾。同時，這一規模宏大的知識再造工程獲得吳國公亦黑迷失的官方支持，其身份兼具集賢院使與地方官僚雙重角色，體現了元代宗教出版中“以官監民”“以民承辦”的協同模式。此種模式既保障了刊經的合法性，也為民間教團提供了運作空間，反映元代宗教政策在實踐中的靈活性與階層互動的複雜性。

募刻元刊《毗盧藏》的白蓮教眾之中，主要的負責人在福建勸募的報恩萬壽堂嗣教陳覺琳，另有在河南勸募的陳覺圓。何梅認為二人是同族人。這一觀點出現在與李富華合著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一書中。該書認為，陳覺圓和陳覺琳二人姓名的前二字相同，據此可推斷，二人或為親屬，或為本家或同族。

三、《毗盧大藏經》的性質

元刊《毗盧藏》的勸募人，有時也身兼出資人的身份。他們由世俗階層構成，在信仰層面具有明顯的同質化傾向。通過分析白蓮教眾的法名，可以厘清刻藏勸募人之間的關係，進而對進一步確定該藏的性質提供線索。

（一）白蓮教眾的法名

關於白蓮教眾的法名，楊訥在《元代白蓮教研究》一書中還提到了不少材料。比如，元代危素（1303-1372），字太樸，江西金溪人，有《危太樸集》傳世。《危太樸集》引用的有關白蓮教堂庵的記述中，出現了法名「覺緣」的屠文正，屠文正之子法名「覺興」。廬山東林寺白蓮教

善法堂主僧普度，俗姓蔣，丹陽（今屬江蘇）人，「家世事佛，弱冠出家」，編有《廬山白蓮教寶鑒》，他在書中提到：

去聖時遙，人多謬解，雖期正道，悉陷邪宗，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群邪詭惑，諸黨並熾，是非蜂起，空有云云，夾截虛空，互相排毀。……有執我宗「普」字「覺」字者，有言彼宗「妙」字「道」字者，是皆私偷此鏡入彼邪域，致為塵垢蔽蒙，不明宗體，雖得此鏡之名而不得其用也。

由此可知，當年以「普、覺、妙、道」四字命名的白蓮教徒，如今反以此四字作為不同分支的標誌，可見白蓮教當時已經出現了不同的宗派，相互韻頌。

元代盧琦有《寓平南善應庵述懷》一詩，記述了善應庵修建的始末。該庵修建時，白蓮教眾陳覺堅捐出自家私宅以供奉養。陳覺堅先前創建過安福庵，其徒陳覺慶與後灣的陳覺正也是道人，陳覺慶弟子陳覺榮仍是道人（優婆塞），陳覺堅之孫覺真已削髮為僧。另外，關於教中的「覺」字輩信徒，以陳姓居多，關係複雜，可能是父子，也可能只是師徒。由此可知，元代建陽募刻《毗盧藏》的事業，是報恩堂內部自發的行為，得到官方大力支持與信眾、教外人士的積極回應。

（二）劝募人的关系

元刊《毗盧藏》的募刻地分佈極廣，「涉及福建道（今福建省）建寧路建安、建陽縣、政和縣，邵武路在城、邵武縣、建寧縣；撫州路崇仁縣（今江西省）；河南江北道固始縣（今河南省）；陸安州陸安縣（今廣東省）等地區。」該藏出資人都是下層民眾，募刻人基本都是白蓮教教眾及教外信眾。卷首的牌記也說明了白蓮教刊刻佛經的偉業，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與幫助。出資人雖來自各地，但基本分佈於長江以南的地區，很少出現北方地區的出資人，這可能與白蓮教在北方影響相對較弱有關。

元代白蓮教信徒多以「道」「智」「圓」「普」「妙」「覺」等明顯的字型大小為名。據田海研究，元刊《毗盧藏》刊記中提及的 45 名居士，有半數以上姓名中帶有這種字型大小，其中，有 19 個是「覺」，有 6 個是「妙」。按照佛教的取法名的傳統，陳覺琳和陳覺圓同屬白蓮教眾，都是「覺」字輩的。

元代釋惟則撰有《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十卷，今見元至正間姑蘇師子林刊明代修補本。卷首有釋迦說法版畫，卷端有牌記，現藏於臺灣「國家圖書館」。其後為惟則所撰《會解敘》。該經為元代後期所刻佛典，形制與早期佛典有異，因其未入藏，難以確定所屬系統。然而，從其卷三末一則刊記中可找到一些線索：

常熟州承化里何舍土地渡江大王界居弟子嚴憲，同室張氏妙真施財刊第三卷。近景福遠植勝因，歸命總持不動尊，隨眾生而心周徧法界。今我早登乘上覺，度恒沙眾而名報佛恩¹²。

根據嚴憲之妻張氏妙真的姓名字型大小，張氏或為白蓮教女信徒，《大佛頂首楞嚴經會解》卷三施造人或與元《毗盧藏》募刻人在信仰層面有著共通性。

元刊《毗盧藏》的勸募人以為白蓮教眾居多，偶有教外民眾。從刊記中的謝覺戒、宋覺會、劉覺直、李覺慶、黃覺貴、謝妙心、龔妙真、陳妙清、王妙法、楊妙義等人名來看，後山報恩萬壽堂的男教徒以「覺」為名，女教徒以「妙」為名。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陳覺琳與陳覺圓二人只是同姓，在教中又同屬「覺」字輩。因此，通過觀察眾勸募人的署名，可知他們是普通教民關係。

（三）元刊《毗盧藏》的性質

從卷末刊記可以看出，元刊《毗盧藏》的募刻人包括兩類，一者來自教內，即報恩後山堂男女信眾，如覺、妙，在刊刻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一者來自教外，即尚未入教但認同教義的施主，如十三娘、朱大哥之類，他們的積極回應，對本次刊經事業提供了支持。卷末出資刊記多次出現

吳國公亦黑迷失一行署名，代表了本次刻經活動是經過官方許可和資助的合法行爲，應將亦黑迷失視爲「出版許可人」。

該藏資金源於白蓮教眾與庶民階層的分散募捐，刊記中施主姓名多含「覺」「妙」等法名字型大小，如陳覺琳、張妙真等，印證了田海所述白蓮教「俗家信徒主導」的特徵。不同於官刻藏的刊工固定，該藏實行「包刻到人」，每卷由不同施主獨立出資刊版，因而字形、版式存在細微差異。這種「官民協同」模式，既依託官方支持，又凸顯了民間教團的主體性。

元代對宗教出版事業管制較嚴，尤其是民間團體的出版活動。因此，卷首刊記中的文武百僚云云，實爲陳覺琳等負責人爲了保證刊經活動能得到官方許可，保證各環節順利進行而發佈的「免責聲明」。亦黑迷失作爲百僚之長，爲刊經之舉提供了資金和制度保證，結合戴蕃豫所言「出資皆庶民階級」，可知該藏的刊刻促進了白蓮教眾與教外民眾的信仰互動，白蓮教的影響力得以擴大，這些說明了元刊《毗盧藏》是一部私刻漢文大藏經。

四、元刊《毗盧藏》的流布

關於元刊《毗盧藏》的流布路徑，學界一直未予確定。究其原因，一是該藏存量有限，得到的關注較少；二是由於材料有限，該藏一度被誤作宋版藏經。因此，有必要對諸多誤區逐一辨正，在此基礎上明確該藏的流布下落。

（一）「頒賜百寺」爲宋版

元《毗盧藏》在刊行之後，分舍大都、河南、寧夏、兩淮、江浙、福建地諸多寺院，每年定期公開展出，供信眾閱讀。泉州明倫堂內舊存爲亦黑迷失所立《一百大寺看經記》碑，碑文記載亦黑迷失在延祐二年主持刻藏工作，擬在全國範圍內評定一百所大寺，選定寺院之後，再「各

施中統鈔壹佰定，年收息鈔，輪月看三乘聖教一藏，其餘寺院、庵、堂接待或舍田施鈔，看念四大部《華嚴》《法華》等經，及點照供佛長明燈」。碑文詳載了四大部經的刊刻始末，還涉及福建境內收藏《毗盧藏》的地點，包括鼓山湧泉寺以外福州、泉州、興化等地的 37 個寺院，後諸寺所藏佛典基本散失，因此鼓山所藏零本尤為重要。

《一百大寺看經記》所載《毗盧大藏》，並非元刊《毗盧藏》。徐曉望認為《毗盧藏》共 6117 卷，初刻於宋，直到元延祐年間才完成。王鐵藩經過調查，發現《毗盧藏》並未刻印百部、分送百寺，而只印成 37 部，分藏於碑文所載 37 寺。因《法華》不屬《毗盧藏》「四大部經」，對照徐氏所言《毗盧藏》卷數，可知此《毗盧藏》為宋福州開元寺本。

（二）「四大部藏」為主體

詹石窗等曾指出，「福建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在建陽後山報恩寺發起開雕《毗盧大藏》的活動。雖未全部刻竣，但所刻成的《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四大部，亦稱《延祐藏》，直至民國年間尚藏福州市鼓山湧泉寺」。可知，民國時期只有福州鼓山湧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兩地有藏本，且均殘缺。

1932 年，日本佛教學者龍池清到福建鼓山調查佛經，其時寺中收藏佛經四萬餘卷，元刊《毗盧藏》本《般若》六百卷恰在其中，龍池清稱其字體秀麗，比《普寧藏》版式更加精美。梵輝也認為元刊《毗盧藏》「雖非全帙，但字體相當秀麗，較諸元代之（杭州）普寧寺版為優」。民國湧泉寺住持虛雲法師曾參與修補三大部經，其《修補古經跋言》詳述了湧泉寺諸法師發心手抄三經的始末：

此《大般若經》六百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大涅槃經》四十卷，皆延祐間福建省嗣教陳覺琳刻，相沿度置法堂中。我鼓山湧泉寺明清以來，四賜龍藏，而此本久無人披讀，莫知其全缺也。今年夏，門人觀本明一始出而檢之，三經共殘缺四十餘卷。知客清福師倡募裝潢，而首座慈舟法師、西堂寶山師，暨宗壽、興證、通化、聖修、純

果、法真、龍洗、慎足、傳道、澄朗、優定、能復諸師等，復發心手鈔，足其卷數。此三部古本大經，乃煥然復新。

民國二十一年（1932）壬申歲季秋
湧泉寺住持虛雲敬識

從此跋也可看出，《般若》《寶積》《涅槃》等三大部經至民國已是殘本，後由湧泉寺慈舟等諸位法師共同手錄，才補足了三經殘缺的部分。1930年代，鼓山湧泉寺尚存部分殘卷，住持盧雲法師組織僧眾手抄補缺。1957年，王鐵藩赴鼓山調查文物，發現湧泉寺所藏四大部經尚有762卷，其中約有50卷為補抄本。此後，該藏零本陸續被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學者通過調查與影印整理，逐步釐清其存世情況。

因此，延祐二年建陽所刊「四大部經」，實為元刊《毗盧藏》的主體部分。元代這種「小藏經」並非只有一部。元吳興妙嚴寺刊版藏經也是由《般若》《寶積》《涅槃》《華嚴》等「四大部經」組成的小藏經，版式同《磧砂藏》。可以說，「四小藏」的編排、刊行傳統發端於建陽後山報恩萬壽堂版《毗盧藏》，定型於湖州吳興妙嚴寺版大藏經。

（三）「延祐藏」別為一種

元刊《毗盧藏》因刻於延祐年間，很多論著也稱其為「延祐藏」。1984年夏，北京智化寺發現三卷元代刻本藏經零本，何梅稱之為《延祐藏》。然而，何梅所論「延祐藏」是不同於《毗盧藏》的另一部元刊藏經，原因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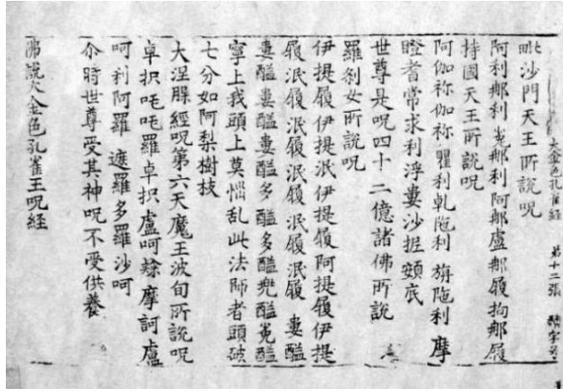


圖 5：智化寺所見《延祐藏》本《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Figure 5: Yanyou Canon Edition of the Buddha's Discourse on the Great Golden Peacock King Dharani Sutra, Seen at Zhihua Temple.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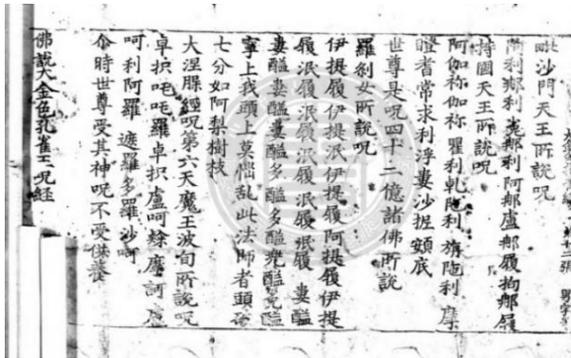


圖 6：國圖藏《金藏》本《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

Figure 6: Jin Canon Edition of the Buddha's Discourse on the Great Golden Peacock King Dharani Sutra, Preserved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¹⁴

第一，刊刻時間不同。「延祐藏」開雕於延祐三年（1316），元刊《毗盧藏》開雕於延祐二年（1315），「延祐藏」的刊刻時間晚於《毗盧藏》；

第二，性質不同。「延祐藏」是官版藏經，《毗盧藏》是私版藏經；

第三，版本譜系不同。綜合何梅的研究，可知「延祐藏」是《金藏》在元代的再刻本，二藏皆卷軸裝，「延祐藏」在字形、字體、版式方面覆刻了《金藏》，二者同屬北方一系。元刊《毗盧藏》刻藏中心在福建建陽，代表元代建本，為南方系私刻藏經代表，版式與《磧砂藏》《普

寧藏》同為經折裝。與元代官刻「延祐藏」相比，元刊《毗盧藏》雖同為延祐年間刊行，但二者分屬南北兩大刻藏系統。

《延祐藏》是元刊《毗盧藏》之外另一部元官版漢文佛教大藏經。除延祐二年後山報恩萬壽堂的刻藏活動，元代還刻了兩種《毗盧藏》：其一為大德九年（1305）泉州城南廂善濟坊坵山圓明堂東界奉蓮戒弟子林德士、德誠募刻《大毗盧藏經》；其二為至大元年戊申（1308）福建道泉州路在城護國水陸禪寺募刻印造《毗盧法寶大藏》經文。兩次重印的都是宋刊《毗盧藏》，傳至今日，泉州開元寺僅剩兩箱殘頁（凡 1363 頁）而已。何梅考訂北京智化寺藏「延祐藏」實為官刻系統，與元刊《毗盧藏》分屬南北兩系。前者開雕於延祐三年（1316），晚於後者一年，且「延祐藏」版式、字體均仿《金藏》，與元《毗盧藏》的建本風格無直接關聯。長期困擾學界的「同名異藏」問題，終得以厘清。

（四）動亂劫火致零殘

1936 年，著名作家郁達夫提到鼓山湧泉寺藏有一部佛教經典，根據日本學者常盤大定 1929—1936 年間的調查報告，這部經典無疑是元刊《毗盧藏》¹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鼓山尚存清康熙、乾隆間的「御頒藏經」，計「明朝南藏」「清朝梵本」「書本藏」「日本敘藏」等經書計 20346 冊，此外還有明清兩代及近代鼓山印刷的各種經書 7586 冊，清代手抄經書 225 冊，刺血書寫經書 657 冊及緬甸貝葉經 7 冊，唯獨不見《毗盧藏》。國內僅存四大部經零本，未見《毗盧》全帙。究其原因，從常盤大定等對《毗盧藏》流布下落的記述中，便可知此藏是毀於劫火了。

該藏刊成後，曾通過“頒賜百寺”機制流通於福建、江浙、河南等地寺院。明代以後，因戰亂、劫火與自然損毀，全帙不存。目前零本散見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山西圖書館及日本、美國等機構，其中以南京圖書館藏量較豐。元刊《毗盧藏》歷經戰亂，國內已無全帙，其零散經本合計 460 餘卷，散藏於國家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湖北省圖

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以及上海、天津、南京圖書館，旅順博物館和泉州開元寺。該藏國外零本也較分散，美國見存本不足 10 卷。民國初年，鼓山湧泉寺藏本已殘，幸賴虛雲法師組織寺內諸僧補抄方得延續。相較而言，《普寧藏》因流傳於日本寺院，保存完整，易窺全貌。如今，北京如是人工智慧研究院對宋元各部漢文佛教大藏經進行了數位化工作，將來或有機會看到這些影印圖檔。

五、結語

本文以學界關注極少的元刊《毗盧藏》為出發點，從現存零本殘卷的共性問題入手，重點關注其在刊記、字體、行款、等版式方面的特徵，比較該藏與其他刻本藏經的版式異同，從而揭示該藏的性質與歸屬，把握其刊行過程與流布下落。在具體的研究中，選取宋刊《毗盧藏》《延祐藏》等為比較對象，體現元刊《毗盧藏》在藏經刊刻史中的地位。

通過對元刊《毗盧藏》進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藏經刊刻是一個跨越空間活動，版刻字體會呈現出地域性特徵，既有筆劃的流變，也有形體的差異，通過比較這些版式特徵，可以明確其版本系統。其次，民間私刻藏經因資金是多方籌措，刊工來源不一，出資人署名的情況較普遍，僱傭過程簡化、工作量小、計酬方便致使刊工資訊缺失。再次，經版為木質載體，刊工以刀代筆，刊板時難免會帶有本人書寫偏好，因此會在筆劃粗細、書寫風格、頓筆特徵、同字異形等方面存在差異，通過比對私刻藏經與官刻藏經的不同刊刻特徵，為宋元出版印刷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最後，對藏經刊記的時間也要辯證看待。對於那些刊刻週期短、時間跨度不大的小藏經，刊記所載時間或可反映藏經刊行時間。反之，就需要分階段分別加以考察，歷時地把握刻藏這一整體工程。

通過本文的研究，亦可看出民間團體在參與出版印刷事業時，聯合教外人士，往往能與官方機構發揮同等作用。藏經刊刻與非宗教階層在經濟、文化和社會三方面存在互動關係。首先，經濟方面，該藏是元代民

間白蓮教團在官方許可下主持刊刻的私版藏經，體現了“募刊合一”的社會運作機制。此機制下，教眾與庶民通過資金、勞力與信仰的參與，在佛教典籍生產中發揮了與官方機構同等的主體作用；其次，文化方面，該藏在版式與字體上融合宋元風格，呈現地域性與時代性交融的特徵，為元代建本研究提供了典型範例。其與《普寧藏》《延祐藏》的差異，反映了元代佛教出版中多元系統並存的格局；再次，社會方面，該藏的流布與存佚，折射出宗教文本在戰亂、政策變遷與社會接受過程中的“物質生命”。其零本的散藏與修補史，也是佛教文獻傳承與文化記憶延續的縮影。因此可以說，該藏的刊刻與流布，不僅滿足了白蓮教眾與地方信眾的讀經需求，也成為教團擴展社會網絡、提升文化聲望的途徑，其“官民協同”模式，也為後世民間宗教出版提供了參照。

Acknowledgment

本文獲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日藏《普寧藏》的編纂、刊刻與流布研究」（25YJC730003）、延安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項目「日本增上寺所藏《普寧藏》研究」（YAU202508136）資助。

Conflict of Interest

本論文不存在任何利益衝突。

Notes

- ¹ 田海（Barend ter Haar）認為，元刊《毗盧藏》是《磧砂藏》的覆刻本。然而，田海引用的臺灣版《中華大藏經》第一輯收錄了1931-1936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磧砂藏經》。該影印本在編撰之初，即發現《磧砂藏》有殘缺，條件所限，用宋元明不同版本《磧砂藏》進行配補，類似於「百衲本」。田海未得目驗原本《磧砂藏》及其影印本，所引影印本《磧砂藏》的再影印本，已非宋版《磧砂藏》原貌。
- ² 小川貫弑最先提出要界定元刊《毗盧藏》的勸募主體。他認為白蓮宗僅指一些像廬山東林寺那樣有名僧指導和嚴格教義的白蓮社會。反之，那些在民間流傳很廣但教義淺薄、無名僧指導的白蓮社會，只能稱作白蓮宗，而非白蓮教。小川認為這個堂是教義淺顯、無名僧指導的大眾信仰團體，屬於白蓮教。
- ³ 2008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毗盧藏》本《大寶積經》零本2冊、山西省圖書館藏元刊《毗盧藏》本《大方廣佛華嚴經》零本1冊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2009年，南京

圖書館藏元刊《毗盧藏》本《大寶積經》1冊、《大般涅槃經》1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27冊，湖北省圖書館藏元刊《毗盧藏》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1冊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目前以南京圖書館藏量最多。

- ⁴ 此處的《大普寧寺藏》元普寧寺版，即白雲宗所刻《普寧藏》。該藏國內已無全帙，目前主要藏於日本增上寺。
- ⁵ 禪林以《華嚴》《涅槃》《寶積》《般若》四經為「四大部經」，此說法較為統一。
- ⁶ 建昌州，故漢海昏縣地，劉宋時海昏被分拆，併入建昌，入元之後改建昌州，隸屬江西行省。陸安州，元隸屬河南行省盧州路，治所合肥。
- ⁷ 此《元官藏》零種現藏於雲南省圖書館，共計23種、32冊。
- ⁸ 禪林以《華嚴》《涅槃》《寶積》《般若》四經為「四大部經」，此說法較為統一。
- ⁹ 此零種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現藏於山西省圖書館。該圖引自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數據庫：<http://gjml.nlc.cn/#/exploration>
- ¹⁰ 該圖引自日本增上寺三大藏網站，此藏公佈於2024年5月，網址：
https://jodoshuzensho.jp/zojoji/yuan/viewer/038/075/09/mir_038_075_09.html
- ¹¹ 該圖引自影印宋版藏經委員會1931-1936年出版的《影印宋磧砂藏經》第五百五十八冊。
- ¹² 該刊記引自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資源資料庫」：
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87b031c02ef3444faa3f786e8bc0c33afDc00TA00.rHOeIummlsBsff_rfGyzVCqzp91Amg5PIply32Zhzmq_&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 ¹³ 該圖引自何梅：《北京智化寺元〈延祐藏〉本考》。
- ¹³ 該圖引自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
<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892&bid=199344.0>.
- ¹⁵ 郁達夫在《閩遊滴瀝》中提到：「這一部經文，前兩年日本曾有一位專門研究佛經的學者，來住寺影印……現在正在東京整理。若這影印本整理完後，發表出來，佛學史上，將要因此而起一個驚天動地的波浪。」據此可知，1936年的鼓山湧泉寺尚有《延祐藏》之蹤跡，鬱達夫或曾目驗此藏。但從刊刻年代及規模來判斷，此「延祐藏」即後山報恩堂萬壽堂所刊《毗盧藏》，詳見福州晚報社《福州史話叢書·鳳鳴三山》，四輯。

References

- Chen, Binqiang, Chen Donglong, and Wang Wanying, eds. 2021. *The First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Quanzhou Maritime Silk Roa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Text] 陳彬強、陳東瓏、王萬盈 編，《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獻匯編初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Chen, Zhiping and Zhan Shichuang. 2003. *Insight into Southeast China*.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Text] 陳支平、詹石窗，《透視中國東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Dai, Fanyu. 1995. *Spreading of Chinese Buddhist Canon Carving Origin: 101, 51*. Beijing: Catalogu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戴蕃豫，《中國佛典刊刻源流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Fan, Hui. 1985. "Conversations on Famous Mountains and Grand Temples in Fujian." *Fujian Yixian Art Academy*: 15. [Chinese Language Text] 梵輝，《福建名山大寺叢談》，福州：福建省藝仙美術院。
- He, Mei. 1999. "Research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Pilu Cano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Issue 3. [Chinese Language Text] 何梅，《〈毗盧大藏經〉若干問題考》，《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
- Huang, Zhongzhao. 1976. *Bamin Annals*, in *Fujian Local Chronicles Collection*, vol. 76: 813.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黃仲昭纂，《八閩通志》，《福建地方誌叢刊》第76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Jing, Hui, ed. 2009. *A Collection of Master Hsu-Yun's Works*, volume 2: 135.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虛雲和尚全集》第2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Li, Fuhua and He Mei. 2003. *Research on Chinese Tripitaka: 354, 355-356*.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 Text]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Lu, Qi. 2008 Guifeng ji, edited by Ji Yun.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Wenyuan Pavilion Copy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259: 5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Chinese Language Text] 盧琦，《圭峰集》卷上，載紀昀、永瑤等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9 冊，台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Ogawa, Kan'ichi and Lin Ziqing. 1988 "Miscellaneous Records of the Tripitaka Printed at Miaoyan Temple in Wuxing." The Voice of Dharma. [Chinese Language Text] 小川貫式、林子青，《吳興妙嚴寺藏版雜記》，《法音》。
- Song, Lian et al. n.d. The Yuan Dynasty History: 3198-320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Chinese Language Text]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
- ter Haar, Barend 2017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Translated by Wang Rui and Liu 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Chinese Language Text] 田海，《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王銳、劉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Wang, Tiefan. 1995 Conversations on Mindu: 431-432. Fuzhou: Haichao Photography Art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王鐵藩，《閩都叢話》，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
- Xu, Xiaowang. 2023 History of Fujian in the Yuan Dynasty. Beijing: Jiuzhou Press. [Chinese Language Text] 徐曉望，《元代福建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 Yang, Ne. 1989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in the Yuan Dynasty: 66, 72-7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Chinese Language Text] 楊訥，《元代白蓮教研究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

- Yang, Ne. 2017 *Research on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in the Yuan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Text] 楊訥, 《元代白蓮教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You, Biao. 2011 "Buddhist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The True Status Quo of Buddhist Belief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5: 93–100. [Chinese Language Text] 游彪, 《佛性與人性：宋代民間佛教信仰的真實狀態》,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Zhen, Dacheng. 2022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variant characters i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oday*, April 8th. [Chinese Language Text] 真大成, 《加強漢文佛經異體字全面研究》, 載《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2年第4期。
- Zhu, Xi. 2019 "Leaving Quell in the west, going into a haven of clouds and waters." Research Office of Party History and Local Chronicles of Jianyang District Committee, Nanping City, CPC. [Chinese Language Text] 祝熹, 《西出關里, 雲水桃源》, 南平: 中共建陽區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